

# 谱写敦煌文化传承新华章

## ——敦煌文学研究历程及最新动向

李小荣

在国际敦煌学界，文学研究是起步最早的领域，经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姜亮夫、王重民、潘重规、周绍良、饶宗颐等数代中外学人百余年的艰辛探索，已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而统观过往的敦煌文学研究，我们发现其研究路径主要有三：

一是从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各类文学作品出发，通过文献辑佚、版本校勘、校笺等方式，对敦煌本《文选》《文心雕龙》，传世名家名作（如李白、白居易等）及敦煌当地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整理与研究，像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王重民、王庆芬、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敦煌变文集》，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等，即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二是从文类或文体出发，多聚焦于各类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变文、声诗、曲子词、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小说等），并对文本进行社会文化背景、思想情感抒写、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分析或传播接受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项楚、张子开、谭伟、何剑平《唐代白话诗派研究》，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杨明璋《敷演与捏合：敦煌通俗叙事文学的叙人体物》，王晓平《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行的敦煌故事》《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行的敦煌佛教文学》等。

三是以敦煌藏经洞所出文学文献为中心，但在时空上大有拓展，以通史眼光对敦煌地区的文学活动、文学生产和消费进行历史描述和探源，旨在构建“敦煌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典型者有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钟书林《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研究》、伏俊琏等著《敦煌文学总论》（修订本）。

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者基于时代学术思想之立场，对敦煌文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比如，20世纪上半叶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界倡导白话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学术理念，由此催生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传世名著，接续这一传

统的则有杨公骥、高国藩、张鸿勋、金荣华等学人。20世纪下半叶，任半塘克服种种困难，倡导建立唐代音乐文艺学，身体力行，撰出《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总编》等经典名作，其培养的博士弟子王昆吾、李昌集及再传弟子孙尚勇、张长彬、柏红秀等，亦长期耕耘于此领域而多有创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在第一任会长季羨林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地编纂出版《敦煌学大辞典》及大型敦煌文献图录，协调成立国家图书馆、新疆、兰州三个敦煌学研究资料中心，团结海内外研究者，使敦煌学研究迅猛发展，研究水平迅速提升。最近10多年来，郝春文、荣新江两任会长持续发力。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考察调研发表重要讲话后，敦煌研究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敦煌文化传承谱写出精彩的新华章。作为敦煌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敦煌文学研究，21世纪以来也出现了不少新动向：

一是“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大有拓展。由颜廷亮、柴剑虹撰写的“敦煌文学”条目说“指保存或仅存于敦煌莫高窟的，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文学作品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现象与理论”（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这代表的是20世纪对敦煌文学的一般看法。事实上，单就颜廷亮自己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书稿《敦煌文学千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而言，其时间远远超出了他此前限定的“唐、五代、宋初”，空间则扩大到了历史

上的敦煌地区。换言之，综合源流、变迁、传播、接受与影响等多重视角，进而把敦煌文学置于丝路文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已成为新世纪敦煌文学研究的普遍态势，如汤涪《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富世平《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研究》、刘晓玲《敦煌僧诗研究》、喻忠杰《敦煌写本戏剧发生研究》、邵文实《敦煌文献中的女性角色研究》等，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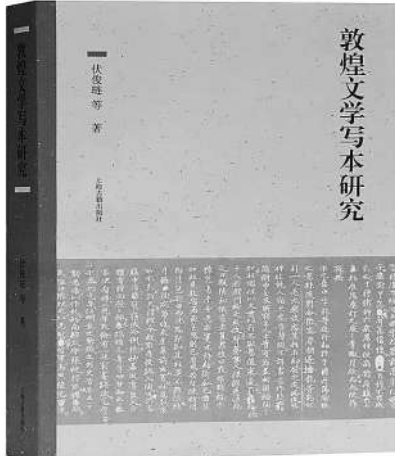
二是更关注仪式类作品。众所周知，敦煌文献以宗教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为主体，无论哪种宗教，其文化、文学传播都离不开仪式。20世纪末，相关研究论著仅有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等少数几种，进入新世纪后则涌现了一大批著作，如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易宏《六朝隋唐道教科仪研究：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王三庆《敦煌佛教斋愿文本研究》、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笔者《敦煌密教文献论稿》《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敦煌道教文学研究》等数十种专著。此外，敦煌文献中涉及婚仪、书仪、仪仗乃至民俗生活礼俗的作品也不少，它们同样可以从仪式角度切入，如陈烁《敦煌文学：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就作出了较好的示范引领。

三是更关注文学写本研究。敦煌文学文献的物质载体，除《故园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等极少数为刻本外，绝大多数都是写本。写本在书体、书写款式、文字音韵、书写符号、讹文正误等方面自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对此已有全面的总结），

研究者如果不懂辨伪存真，极可能会依据错误的录文、释文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朱凤玉、郑阿财以“写本原生态”为原则，分别发表《敦煌诗写本原生态及文本功能析论》《敦煌写本高僧因缘记及相关文献校注与研究》，给人诸多启示。伏俊琏等著《敦煌文学写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则用大量案例证明了“一个文学写本就是文学作品集”，“敦煌文学写本是纸写本时代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集”，并展现了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的灿烂前景。

四是更关注多学科融合。敦煌文学作品多为实用的仪式性文本，常与表演有关，如P.2044《闻南山讲》描绘佛教俗讲情景“于是张翠幕，列画图，扣洪钟，奏清梵”，可见配合文学文本讲唱的至少有音乐与图像。梅维恒的名著《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杨继东、陈引驰中译本，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即从多学科融合视域对敦煌变文的源流、创作、表演、流播与影响作了全面的综合性检讨，从而建立了变文研究的新范式。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及笔者《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等，都受到了梅氏方法论的影响。其实，敦煌文学中的大多数文类，如避真（赞）、斋文、愿文、礼忏文、授戒文、书仪等，皆含有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中外文明交流史等多种文化信息，只有从多学科融合切入文本细读，多维度诠释，才能发掘其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



敦煌文学研究著作

# 唐代的“四善”说

王杰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共传21个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兴盛和开放包容，吸引世界各国学习，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开元盛世（公元712年—公元742年），国家人口超过5600万，长安人口就达100余万。“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这首诗将开元盛世尽收眼底。唐代无论政治、军事、文学、医药、制造业都是世界一流的。

从官箴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唐代对管理国家的官员是如何考核的。

唐朝对官吏的考核可以用“四善”“二十七最”来概括，其中“四

善”专门用来指代官员品行，“二十七最”，是指各级官吏的职务所具有的职业素质。“四善”以“德”为本，而“二十七最”则以“才”为本。

“四善”具体包括这些内容：一善德义有闻，二善清慎明著，三善公平可称，四善恪勤匪懈。

一善德义有闻，就是说居官者应该“德高望重”。《论语·为政》篇中讲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拱之”。居官者，首先应该是德行高尚者，是在人品上靠得住的正人君子。《大学》中讲“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致”，孟子也说，“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如果是道德败坏的人居于领导岗位，那便如洪水猛兽，是把邪恶和歪风邪气播撒给全社会了，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德”是立身之本，人无德不立；“德”是立国之基，国无德不兴。

唐代对居官“四善”说，把“德”放在第一位，从国家的层面上，考核官吏，首重其“德”，可见唐代选人用人的价值导向便是“美德”。唐代政坛圣君贤相辈出，国家

兴盛，与考绩官吏的“德义有闻”无关系。

二善清慎明著，就是为官者要清廉、谨慎。

这是对唐代官员品、行两个方面的要求：居官要清，办事要谨慎。

居官为民，一心做事，毫无私利，这是一种大爱，更是一条政治红线、廉政红线。在唐诗中有一句“长官清廉太守好”的描述，是对当时政治生态的概括。唐太宗李世民注重亲自考核县令，而不是吏部能一手包办官吏的考绩和使用，根据各县令的政绩，决定提拔还是留用与罢黜。

三善公平可称，要求官员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通俗地讲，就是要求官员遵守职业道德。唐太宗希望官员都能做个循吏和干臣，带头提要求，并严格考核官吏，坚持不懈，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国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安定、政治清明、重视廉洁、重视人才、重视国计民生。

四善恪勤匪懈，就是忠于职守，谨慎而不松懈。

这是要求官员有能力干事情，能干成事情，持之以恒地为民谋福利，

为朝廷办实事，如兴修水利工程，劝课农商，注重国际交流和对外贸易等。

唐代对官吏实行“考课”的政绩量化制度。其中的“考”就是是否推行国家任务情况，“课”就是完成国家任务情况。不同级别的官吏，有不同的标准和任务。每一次参加“考课”的官员，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优缺点，写一份“考状”，叫作“书考”，之后由各部门的官员来决定等级，然后张贴在告示上。最后按品级加减俸禄，以示赏罚。

唐朝“四善”的建立，对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王朝兴盛的表现。“四善”说的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当代社会虽然与唐代不同，但依然需要德才兼备的官员，需要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秀的才能素质相辅相成。我们需要注重选人用人的价值导向，重视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同时，也要注重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和评价，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制度，让领导干部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提高工作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 《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出版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新时代政治思维方式研究丛书》出版发行。这是一套研究国家治理的理论丛书，共计“以人民为中心”“民主和法治”“效率和公平”“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创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中的道德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卷本，200余万字。丛书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治思维方式的更新为主题，以着力建构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哲学为学术目标，对于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该丛书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

主任陈晏清教授团队担纲编写。陈晏清表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问题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非常广阔的知识领域。这套丛书的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多个领域。“对于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来说，这套丛书的创作和出版，也是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研究这个课题意义很大，难度也很大，这是对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而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的，很难达到对它的及时的、准确的、深度的把握。目前，我们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事业还在路上，我们对它的理论研究不会停步。”陈晏清说。

## 传递感人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杨雪

她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也代表着上海文艺的一个时代。

5月9日，“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逝世一周年之际，“德艺双馨·艺术常青——人民艺术家秦怡同志纪念座谈会”在上海市文联文艺大厅隆重举行。与会者回顾和总结秦怡同志的艺术成就，致敬这位百年中国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学习她永怀赤子丹心的“人民艺术家”崇高精神。

秦怡曾说：“干文艺，不是为谋生，而是为理想。”这种理想需要在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之源就在人民，“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表演给予别人。”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到了秦怡的初心，称她“捧着一颗初心来，满载厚德美誉去”。

回望秦怡的艺术人生，正是用生命的长度与宽度践行她心怀祖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不变初心。秦怡16岁开启舞台生涯，25岁走上大银幕，参演了30多部影片。她始终深信电影中

饱含着精神力量。从年少时离家去抗战前线，到195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直到93岁拍《青海湖畔》，她用一辈子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马兰花开》中能顶半边天的拖拉机手马兰、《铁道游击队》中与敌人周旋的芳林嫂、《女篮五号》中积极向上的篮球手林洁、《青海湖畔》中为高原铁路梦而奋斗的女科学家等，都是秦怡留给观众最亲切熟悉的银幕形象，至今仍激励和鼓舞着人们。

《秦怡传》作者唐明生表示，自己在一次次倾听中从秦怡多难而又多彩的人生中受到很大的教育，更增添了一份对她的崇敬。一次访谈中，唐明生希望秦怡谈谈她的表演心得，秦怡说了三点带有理性和思辨色彩的思考：一、演戏和做人是联系在一起的，文艺需要一种内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二、人物是跟着时代走的，需要长期的艺术实践；三、重要的是要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是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遗产。结合当下演艺界的浮躁心态，唐明生认为这三点思考弥足珍贵，堪称是年轻一代的学习榜样。

## 普及推广古文字 加强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谢颖

日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据介绍，丛书计划出版18卷，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组建的中方团队，与美国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主任夏含夷教授组建的翻译团队合作完成，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每一卷都会介绍学界最新的研究情况，并由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专家对简文进行注释、翻译。丛书将清华简原文、隶定文字、现代汉字和英文一并呈现。为确保质量，英译团队成员定期开会讨论和审查彼此的工作，最后文稿经过国际同行专家严格评审。

本次发布的第一卷《〈逸周书〉诸篇》由夏含夷教授负责翻译和撰写，收录了清华简《命训》《程器》《皇门》《祭公之顾命》《保训》《封许之命》等

六篇与《逸周书》相关的文献。前两章节与附录部分详尽介绍了《逸周书》的文本历史及其与清华简的关系，其余章节则是对清华简六篇文献的精彩翻译注释，并探讨了文献的流传等问题。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表示，本套丛书是古文字工程普及推广工作的重点成果，认为古文字工程的开展应当深入挖掘古文字的思想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国际交流和文明互鉴。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包含丰富的经史类文献，自入藏和刊布以来，引起海内外学界的热烈讨论和广泛瞩目。清华简文辞古奥，理解不易，其价值尚待进一步发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丛书的陆续出版，将为海内外学界了解、利用清华简提供有力帮助，并扩大清华简及中国出土文献的国际影响力。

## 探索国际音乐学术前沿与创新研究

本报记者 张丽

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的“《牛津音乐词典》（第六版）新书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牛津音乐词典》是一部在国际音乐领域享有权威地位的音乐工具书。自1952年在英国问世，历经五次修订，一直紧跟国际音乐学术前沿、反映学科发展新动向。最新的第六版增加250多个新条目，收录总条目已超过1万条，包括音乐术语、音乐体裁、曲式、音乐作品、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音乐理论家、乐评家、乐器种类、音乐专业院校、音乐演出团体、音乐会、音乐专业机构、音乐出版单位以及各类知名音乐节或艺术节等，涵盖海量信息、内容全面丰富，是学习、研究、表演、鉴赏西方音乐的必备单卷本音乐工具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认为，这部词典的面世不仅填补全面研究当代国际音乐领域学术前沿、发展动向、创新研究的空白，也让国内读者了解了新的音乐事象、

音乐人物和创作成果等世界优秀音乐文化。同时希冀出版人立足国际视野，融合多元文化，在挖掘世界音乐文化精品的同时讲好中国音乐故事，为中国音乐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沈致金认为，第六版中译本精品实用的特色和卓越的品质，不仅可以满足专业音乐研究与大众音乐普及的学习、表演、研究、鉴赏世界音乐的需求，更是忠实服务于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为我国音乐工具书的编撰工作提供较好的参考借鉴，为中国音乐发展提供更为多元、广阔的全局视野。



学术观点



一家之言